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
郑炳林 主编

水經注釋卷十七

河隴歷史地理研究

渭水上

刘满著

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

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

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

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南

出谷尚書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

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

過明非一水也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文化出版社

卷十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
郑炳林 主编

河隴歷史地理研究

陳橋驛



刘 满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河陇历史地理研究 / 刘满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 - 7 - 80714 - 652 - 0

I. 河... II. 刘... III. 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地区
IV. K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3362 号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

河陇历史地理研究

刘 满 著

责任编辑 / 周桂珍

封面设计 / 洪 波

题 签 / 陈桥驿 秦理斌

摄 影 / 张文炳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政编码 / 730030

电 话 / 0931 - 845487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厂 址 / 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 1648 号

开 本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 505 千

印 张 / 18.75

版 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次

印 数 / 1 - 1000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714 - 652 - 0

定 价 /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缘起

郑炳林

西北史地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重点研究方向,从事敦煌学研究首先必须研究中国西北历史地理,只有熟通西北史地才能在敦煌学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在西北史地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老一代专家贡献突出,成果斐然,主要体现在中国西北区域历史地理、中外文化交流、古代民族关系、区域史等方面。特别是在敦煌学研究平台建立之后,进一步支撑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使西北史地文化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研究水平。西北史地文化研究与敦煌学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敦煌学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1979年就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年筹建了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了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1999年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作为学科所在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之后,优势互补,珠联璧合,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无可替代的地缘优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采取四种渠道,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第一,举办学术会议;第二,学术访问;第三,申请国外及港台地区的各种基金项目,联合进行学术研究;第四,聘请国内外专家来研究所驻所研究。通过以上渠道,近年来研究所在学术交流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此外还将通过联合共建的形式,与美国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并与耶鲁大学共建中国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便与国际接轨,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

要培养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流的图书资料。在图书资料建设上,研究所采取购买、复制与接受捐赠三种手段。经过近几年的重点建设,本专业图书资料有了很大的改观,不但购买了齐全的敦煌学研究资料,如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永乐北藏、四库全书和续修等大型图书,以及近年或者以前出版的所有能购买到的敦煌学研究参考图书,还利用各种办法购置最近台湾地区出版的敦煌学图书和日文版图书。在图书采购中我们采取集中购买与零星购买相结合、个人购买与集体购买相结合等方法,力图在资料购置上做到齐全,为敦煌学专业培养一流的人才、出产标志性成果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目前,研究所藏书达六万余册,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为敦煌学界提供服务。同时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还注意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留学生和中国港台地区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

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等。对留学生的教授辅导,对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也有很大促进,目前留学生培养已趋于成熟,教学和研修效果反映较好,得到派出机构的称赞。尤其是培养的日本留学生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上崭露头角,出产很多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敦煌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还体现在整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上。敦煌学研究所承担有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特别是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和博士生承担的基金项目增多是本学科的特色。敦煌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与优势,除了对部分文书进行分类整理和专题研究外,还将对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进行整理研究,并逐步开展对甘肃藏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第二,敦煌史地文献与中国西北区域史地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的研究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出产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第三,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结合研究体现了我们的地缘优势。石窟艺术研究是敦煌研究院的优势,已基本完成了敦煌石窟的断代和壁画内容考释等大量的研究工作,代表了敦煌佛教艺术研究的国际水平。兰大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之后,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得到体现。今后还要进一步扩大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提高我们的教学和培养水平,出产更多敦煌学复合型研究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敦煌学人才的培养基地。

中国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优势,特别是老一代专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刊布出来,敦煌学研究所决定以“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名义结集出版,供学术界参考。

自序

—

记得20世纪70年代有一部电影,名字记不清了,讲的是什么故事也忘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大学的老师在给学生上课,他严肃认真地说:“今天我们讲马尾巴的功能。”他的话刚一出口,立即引来台下学生们的轰堂大笑,不用说那位先生当然是十分尴尬的了。电影编导们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其意在证明当时的高等学校是被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里教的也是所谓七分无用、三分被歪曲了的知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马尾巴”几个字就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当时我学的教的都是子曰诗云一类的古文,毫无疑义是属于“马尾巴”一类的东西了。从那以后只要有人问我教什么课,我就说是“马尾巴的功能”。选入本书的文章,大都是关于古代地名和交通路线的,又多是枯燥无味的考证,在那个年代肯定也是“马尾巴的功能”,当然是要被打入另册的。即使在今天,因为这一类的东西远离当前的现实,又不是今天的显学,尤其是在经济上没有什么直接的价值,出版后的结果正如古人所说,只能用来“覆酱烧薪”!本书的出版,要感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郑炳林所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将本书列为该所《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中的一种,给以资助出版的机会。就我的本意,是要将它命名为《马尾巴集》的。但是郑所长要求《西北

史地文化研究文库》中的书名,要一语破的,要让人一看书名就能知道书中的内容。本书是关于西北古代地名和交通路线的考证,涉及的地方大都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等省区,这里地处大河上游,位于陇山东西,故名之曰《河陇历史地理研究》。

我是学中文的,因为读史读诗的关系,总喜欢对古地名的位置、沿革寻根究底,久而久之对古地名的研究也就产生了兴趣。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全国各省市进行了一次地名普查,我有幸参加了甘肃省的地名普查工作。地名普查之后,又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省卷的编写工作。这两项工作前后历时约十年之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甘肃省各市、地、州、县将自己地名普查的成果编印成了86巨册地名资料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省卷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又汇集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我的地名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从参加甘肃省地名普查工作开始的。

甘肃为人文始祖羲皇故里,境内大河奔流,山川雄壮,为交通西域之孔道,历代王朝之肘腋。兰州,自古就是西北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在中西交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从汉唐长安出发的丝绸之路东段,无论是北线、中线还是南线,甘肃都是必经之地;丝路东段的中线(即“秦州路”),在今甘肃境内的里程长达1600多公里,而今从兰州经由郑州到北京的铁路长度才是1800多公里,两相比较,可以看出甘肃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地处甘肃古今闻名的阳关、玉门关,是控扼丝绸之路的咽喉。丝路必经的黄河甘肃段上的风林关渡、金城关渡和会宁关渡,分别位于唐代的河州、兰州和会州,是丝路黄河上的三大渡口。风林关曾是唐代七个下关之一,会宁关是唐代十三个中关之一,而且会宁关渡一度是唐代全国最大的渡口。完全可以说,西北历史的研究,丝绸之路的研究,如

果忽略了甘肃省这一部分,那么整个研究也会失去光彩。

正是因为参加了甘肃省地名普查工作,使我有机会全面地接触、探索甘肃省古今的地名及有关资料,也多次到一些地县去实地考察,同时也有幸结识了省内外的专家和地名工作者,有了向他们学习交流的机会。这不但为我从事地名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使我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专业的古代地名的探索者。在我写的文章中,有不少地方都引用了甘肃省有关地县的地名资料。这些地名资料,是甘肃省各市、地、州、县专家们心血的结晶,内容十分丰富,保存了不少难得的历史和现实资料,是我研究地名必备的参考书。总之,我是从甘肃省地名研究起步,逐渐向周边的省区延伸,进而研究西北地区的古代地名的。

二

回想自己探索古代地名的历程,是经历了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的过程。开始只能是探索个别的古地名,就像画图时一个一个的点。后来认识的古地名逐渐多了,这一个又一个的点就连成了线。再到后来,这些点和线就变成了面。因由点到面,所以早年写的文章就比较零碎些。当然在这些文章中,还是有为方家拾遗补阙的地方。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有专家撰文说:“街亭只能是今甘肃天水市东南的街子镇”,“所谓街亭在今甘肃秦安县陇城东北六十里的街泉亭故城之说,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中国史稿地图集》也将街亭定在今甘肃天水市东南的渭河南岸。我写的《由秦陇通道和祁山之战的形势探讨街亭的地理位置》,主旨就是通过探讨陇山古道来考证街亭位置的,结论是维护了“街亭即街泉亭故城,在甘肃秦安县陇城东北六十里”的旧说,否定了街亭在今甘肃天水市东南街子镇说。这是我探讨陇山古道的开始,后来写的《大震关考辨》、《秦汉陇山道考述》等,也是探讨陇山古代交通路

线的。

在摸索陇山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唐宋时期的大家的著作,如《后汉书》李贤注、《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等书都众口一词,说大震关在今陕西陇县西境的陇山东坡。可是二三百年以后,欧阳修的《新唐书·地理志》却说大震关在甘肃清水县东五十里的陇山西坡。从此以后,《读史方輿纪要》、《大清一统志》等书中就出现了大震关既在今陇县西境的陇山东坡说,又在今清水县东境的陇山西坡说两种说法,而且当今有的权威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二说并存、依违两可的态度。经过研究,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震关在今陇县西境的陇山东坡说是正确的,由于《新唐书·地理志》大震关在今清水县东五十里的错误说法,给后人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混乱。

《鲜水及其有关的民族及交通线路探讨》和《再论鲜水位置的若干问题》等几篇都是关于青海地区古代地名位置和交通路线的考证,考证的结论确实与历来的说法不同。如《鲜水及其有关的民族与交通路线探讨》一文在发表时,《青海社会科学》编者说:“关于鲜水,史籍尝指为青海湖。本文纠正了这一错误,认为鲜水不是青海湖,而是今黑河。弄清楚这一问题,对正确认识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变迁、中西交通,尤其是丝绸之路,有重要的意义。”后来因为有关专家对我的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于是就又写了《再论鲜水位置的若干问题》一文作了回应。经过辩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当然也就深入了一步。我至今认为,鲜水为今甘肃黑河说是可以聊备一说的。如此说不误,那么《汉书·赵充国传》中所记之湟陁至鲜水的道路,就是东晋时法显从今青海西宁到甘肃张掖的道路,说明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条道路已经开通了,而且在中西交通上已占有一定地位了。

兰州自古以来被称作金城,自《大清一统志》提出汉金城故城在“皋兰县(治所在今兰州城关)西南”说和“西古城”说以来,国内一些著名的权威著作都沿袭了这一说法,而且进一步认为金城县是后来才迁移到了今兰州城关。关于汉金城县位置问题,一些权威著作的说法是不一的,有的说在“今皋兰县(治所在今兰州市城关)西南”,有的说“在今甘肃兰州市西北”,还有的说“在今甘肃兰州市西北黄河南岸”等,都使人难以确定其具体位置。至于金城县迁到今兰州市城关的时间,有的说是隋代,有的说是隋开皇初,还有的说是隋大业初,也让人无所适从。针对这些说法,我写了《汉金城县治所地理位置考辨》,指出上述的汉金城县故城位置说,还有金城县城迁移说,“都没有引证古代文献作依据”,因而是不可信的。我们分析了《元和郡县图志》关于兰州的记载,证明“早在前凉时,金城县治就在唐兰州州治五泉县,也就是今兰州城关”。接着又从《水经注》中记载的梁泉入手,提出了《水经注》中的梁泉即今兰州城关的五泉说,而且从交通路线、五泉山传说的演变、兰州城关与兰州西固城两地的比较等几个方面论证了汉金城故城在今兰州城关说。在这十多年里,我一直在继续琢磨金城故城的地理位置,在等待专家学者的高见,并在继续撰文论证汉金城县在今兰州城关说。

总之,如果说我早年写的东西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个别篇章为大家拾了遗,补了阙,仅此而已。

三

比较而言,自我感觉好一点的,或者说言之有物的,还是近几年写的选入本书的若干篇。耳顺而退,浮躁少了,逐渐步入了“从心所欲”的境地,“马尾巴的功能”的研究也完全成了个人的喜好。较之过去,分析问题严肃认真了,也客观冷静了。生性愚鲁,仿佛

到了这时才悟到了学问的门径。如果说本书中还有一些新的东西,或曰新的发现的话,这都是得益于前人的研究,或者说是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来的。这不是现今时髦的套话、空话,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心话,而且这些话都是有事实为证的。当然本书中有些结论是前人的论著中没有讲过的,是我提出了这些问题,加以讨论,而且作出了个人的结论;还有的是在讨论有关问题时,我提出了新的证据,作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或对前人论点作了进一步论证和发挥。如《水经注》中记载的凤林山、二十八渡和二十八渡水以及麦田泉水的位置,历史上有名的萧关的位置,以及回中道北段的具体路线等属于前者;唐廓州治所在今青海化隆县群科镇古城村说,唐会州治所在今甘肃白银市平川区陡城堡说,唐会宁关在今甘肃靖远县双龙乡北城滩古城说等,就属于后者。当然这一类新说法在本书中还是比较少的,比较多的是对前人论点的进一步论证和发挥。

我在探讨唐廓州治所时作出的结论以及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论证,就是向前人学习的结果,是在前人基础上完成的。严耕望先生是研究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的权威,他的《唐代交通图考》是唐代交通地理的登峰之作,也是一部丝路研究上成就很高的著作。在唐廓州治所这一问题上,严耕望先生作了较多的探讨和论证。他先则说,廓州治在今青海循化县西的“甘都堂上下”,而且从廓州至鄯州、廓州至鄯城县、廓州至鄯州龙支县等地的方位和里数作了论证。继而严先生又说廓州治当在贵德城东的“阿什贡上下”,又从廓州至河州、廓州至积石军的方位和里数作了论证(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严先生上下求索,多方论证,还是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关于廓州治所的位置,光绪《西宁府续志》和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只提出了结论,没有作任何的论证。我在探讨廓州

治所时,就采用了陶氏等人的结论,而在论证上采用了严先生的思路和论证方法,从“唐廓州至鄯州、廓州至鄯城县、廓州至河州、廓州至积石军和廓州至龙支县等五个地方的方向和里程,对廓州州治的位置作了论证”,而且以自己实地考察时的所见所闻作为证据,以此说明廓州州治化成县在今青海化隆县群科镇古城村。

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关于唐会州治所会宁县的位置问题。国内的一些著名的权威著作都认为,唐会宁县治在今甘肃靖远县城关。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认为,“唐之会州当在陡城堡地区,或稍北也。然参之下文所考河池及会宁关,又似当在陡城堡东与打拉池间”。正是严先生的会州州治在陡城(笔者按:即今甘肃白银市平川区水泉镇陡城村)地区说及相关的论证启发了我,于是我以严先生的陡城地区说为基础,在今陡城地区继续探索唐会州治所的位置。陡城地区范围比较宽泛,这一带仅古城就有缠州城、柳州城和陡城三座古城遗址。唐会州州治会宁县究竟在哪里呢?几经探索,我提出了唐会州州治在今白银平川区水泉镇陡城村陡城堡古城说。在这个问题上,我除了从会州与原州、会州与河池、会州与兰州等地的方位里数作常规的论证外,还紧紧抓住了会州州治会宁县与黄河的关键记载:“黄河堰,开元七年,河流渐逼州城,刺史安敬忠率团练兵起作,拔河水向西北流,遂免淹没”(《元和郡县图志》)。我们在实地考察时发现,今陡城堡古城与唐会宁县的情况可以说十分相像:黄河自东南向西北,从今陡城堡下流过,现在的河水完全可以说是紧逼陡城,城下的河岸已成了河边的低地。今年四月,我们又一次到陡城堡考察,据村民贺耀文(84岁)、村长张学玺等讲,在陡城东南约四里的黄河东岸一个叫虎头嘴的地方,那里就是旧时的黄河河坝所在地。虽然不能断定这个河坝的修建时间,但是这是一条古已有之的河坝可以说是确

定无疑的。这些情况说明,陡城堡就是唐会宁县城,说明严先生的会宁县在陡城地区说是正确的。这一次,我们还是以自己实地考察时的所见所闻作为论证问题的重要证据。

与唐会州治所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唐代的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的位置问题。因为《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二书都记载了会州与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之间的方位、里数,所以唐会州治所会宁县位置的确定,对于考定上述几个地名的位置关系很大。国内一些著名的权威著作因为将会州治所定在今甘肃靖远县城关,再加上它们对文献中记载的会州与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等地的方位理解有误,所以又作出了连锁的错误结论,将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定在今甘肃靖远县城西南七八十里、远离黄河的高山上。而严耕望先生根据以上二书的记载,明确指出,乌兰关与会宁关“度其今地当在景泰县地区、黄河大弯曲处。乌兰县盖在景泰县治东不远,会宁关则在河之东岸也”。而且说“会宁、乌兰两关相距四里,夹河并置,中为津渡也”。自《读史方輿纪要》、《大清一统志》以来,到今天国内一些著名的权威著作,都认为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在靖远县西南的山上,是严先生提出了在今景泰县地区黄河大弯曲处这一说法,纠正了这一失误。正是在严耕望先生关于唐会州、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的有关论证的基础上,我得以提出了唐会宁关在今甘肃靖远县双龙乡北城滩村古城遗址说,而且提出了乌兰县和乌兰关位置的新说。这一次,我又以自己实地考察时见到的唐会宁关城和附近的唐墓葬群作为论证的重要证据。如果没有严先生关于会州等问题上的高见和精辟论证,我在上述问题上要有所发现是非常困难的。

严先生对学术的敬业精神,对学术的责任感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使我深受教育;他在论证问题时,公平无我的分析组合,他

广泛搜取资料、多方求证的论证方法,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和启发。令人感慨的是,我在前些年才见到了严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而且是有关西北部分的复印本。直到去年下半年,我才购得被誉为“精博绝伦,举世赞扬”的《唐代交通图考》五巨册。在阅读严先生《唐代交通图考》时,才知道严先生使用的还是抗日战争前的《申报馆地图》和《民国地图集》,无论从绘制时间还是其中的资料,这种地图真可以说是中国的“历史地图”。严先生手头竟然没有一本新的中国地图集或者是西北某省的地图集,那就更谈不上到大陆的西北地区来作实地考察了。2001年,郑炳林所长要去台湾作学术交流,行前我曾请他到台湾时拜望严耕望先生,如可能的话请老先生到兰州来讲学,后来才知道严先生早已在1996年驾鹤西游了。凡此种种,说明由于海峡两岸长年的分离,使两地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受到很大的影响。具体到个人,严先生是研究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的,而只能在台湾作研究,这使他的研究工作客观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我自己,是生于斯长于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几年写的东西,大都作过实地调查和实地考察,有的地方去了不止一次。我一直认为,本地人研究本地历史地理问题客观上是有优势的,这个优势就在于可以到当地作调查和实地考察,而这一点的确是十分重要的。与严先生相比,我是本地人,“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够以实地考察的见闻来论证一些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这是身在台湾的严先生无法获得的便利条件。

这里我还要谈一谈萧关和回中道的位置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互相关联的。我前后写了四篇与萧关地理位置有关的文章,到宁夏固原一带实地考察有两次。现在我还在撰写与萧关有关的文章,而且准备今年夏天再一次到宁夏固原一带作第三次考察。关于萧关的地理位置,是《大清一统志》提出了“萧关在固原州(今宁

夏固原市原州区城关镇)东南”说。国内一些著名的权威著作,如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后来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新《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还有最新出版的、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都认为萧关在今固原东南,这是学术界的主要说法,我们称之为“固原东南”说。1981年,针对当时学术界出现的萧关在“甘肃环县西北”说,我写了《萧关位置辨》一文,对相关的文献资料作了分析和辨正,结论是:《元和郡县志》的萧关在平高县(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城关镇)东南三十里的记载是正确的,今注中萧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说是正确的。后来,萧关在“甘肃环县西北”说又提出了新的说法,说文献中关于匈奴“入朝那萧关”是说匈奴侵入了朝那和萧关两个地方云云。2000年,针对这一说法,我又撰写了《再论萧关的地理位置》,当时我从几个方面作了辨驳,肯定了萧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说和固原东南三十里说,而且说“萧关的位置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的任山河”,即今宁夏彭阳县古城镇任山河说。2006年,我又写了《固原访古记——三论萧关的地理位置》。在这篇文章中,对学术界关于萧关位置的几种说法逐一作了探讨和分析,从唐百泉县、朝那故城和唐平高县三地的方位和距离,进一步论证了萧关在今宁夏彭阳县古城镇任山河说。同时我以自己的萧关位置说为基点,探讨了与此相关的回中道的路线问题。萧关与回中道北段的线路紧密相关,如果萧关位置有误,必然导致回中道北段的路线也会出现错误,相反亦然。有不少专家认为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城关镇的南面,这些说法主要有“开城说”、“瓦亭说”、“三关口说”等,都认为回中道的北段是经过今平(凉)银(川)公路的平凉市城关、三关口、瓦亭、开城一线到固原的。我在2007年写的《陇东访古

记——回中、回中宫和回中道考索》认为：回中道不经过今平（凉）银（川）公路的平凉到固原段，也就是说回中道不经过平凉市城关、三关口、瓦亭、开城一线。该文还论证了回中道的起点、经由和终点，尤其是回中道北段的路线，认为：“回中道北段起自平凉东四十里铺，经甘肃镇原县新城镇、宁夏彭阳县白阳镇和古城镇，到固原市原州区城关镇。”

四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马尾巴功能”的研究能为前贤拾遗补阙于万一，我当然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严耕望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有一位朋友拿一本名教授写的书，嘱我审查。“我粗看一遍，发现一百多条错误，差不多半数是地名今释问题。后来又有一次审查一篇博士论文，作者用功甚勤，文章也写得不错，可是也有几十条错误，又多为地名今释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别的错误往往可以含混作解，或谓自有看法，但地名问题是绝对具体的，一错就绝无辩解的余地！但地名弄错，往往也就显示作者对于那件史事并未真懂！”（《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下册，第524页，中华书局2006年12月，）读了严先生的话，真使我如履薄冰，“地名问题是绝对具体的，一错就绝无辩解的余地”！这一点对我所作的考证来说尤其是如此。再说，如果因为我的考证有误，影响了别人，甚至误导了别人作出了错误判断，那就更使我惶恐不已。这里我恳切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

有得就会有失，这里再说一下与本书有关的两处错误。收入本书的《西北黄河古渡考》（一）和《西北黄河古渡考》（二），原来是为谷苞先生主编的《西北通史》一书写的。《西北黄河古渡考》原文较长，约七八万字，而经过压缩并收入《西北通史》一书的只有约两万字，这就是该书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中的“黄河津关”部